

从宋代语料看物量词语法化中的几个问题

陈颖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汉语物量词的语法化过程包括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语法化动因。到宋代,“数十量十名”结构固定下来,量词具备了计量、转指、无定等语义功能。在宋代量词的语法化过程中,量词系统内部成员有数目的增减,通过隐喻和转喻等手段使称量的对象泛化,称量范围有扩大也有缩小。这其中依靠错综交替和语义平衡等机制协调制约着整个系统的发展。

关键词:宋代语料物量词;语法化;语义功能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114-06

物量词丰富是现代汉语的一大特点,物量词系统整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语法化演变过程,即“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1]。量词语法化过程涉及到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量词的语义功能发展:结构上,从上古时期以“数十名”结构为主发展到现代汉语以“数十量十名”结构为主;语义上,从量词产生之初往往具有名词或动词的指称意义,发展出计量事物单位的意义,以至于具有多种其他意义(不定指、定指、类指、转指、定语标记等)。目前的量词语法化研究大多是从结构上分析其语序变化的动因及规律,而少有涉及到物量词系统的语义演变规律,本文以宋代物量词(下文均称为量词)系统为例,着重讨论量词语义演变的语法化规律^①。

一 量词语义演变的动因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数量结构移到名词之前是从汉魏开始的,历经唐、宋,直到元代,“数十量十名”才最后建立,并且可以用于各种句法位置^[2]，“数十量十名”成为汉语包含个体量词的数量结构的优势语序^[3]，因此宋元时期是量词语法化时期。量词结构的固定化是汉语量词结构语法化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语法化已经停止^[4]。

在语义上,汉语量词具备计量、数量转指、无定、指量转指等功能,而跨语言考察指出,量词在其他语言中还具备非定指转指、类指、定指、定指性转指、无核领属定语、有核领属定语、无核关系化、有核关系化等更加概括抽象的语法意义^[5]。观察宋代量词系统的语义功能,发现这一时期的量词在最初基本的指称功能之外,还有其他用法。

无定功能:

①见壁上有幅纸题诗云:满院秋光浓欲滴,老僧倚杖青松侧。^[6]《书滕公诗后·并引》,1023

数量转指功能:

②似那两扇门相似,一扇开,便一扇闭。^[7]1950

收稿日期:2011-01-1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宋代量词研究”(07SB08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颖(1975—),女,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这些用法有的在前代已经产生,但用例较少或有种种限制,而宋代这些语义功能用例大量出现,说明这些用法的确已经成熟,是确定的语法化的表现。但即便如此,这些量词仍保留了部分名词特征。

数词和量词之间可以添加形容词:

③譬如一大块水银恁地圆。^{[8]46}

量词可以重叠:

④片片梅花飞落地。^{[9]906}

这说明,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语义功能上,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即使是现代依然如此,所以宋代只能看作量词语法化的中期阶段。

量词语法化的两个方面——句法和意义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动因,相互促进:“数+量+名”语法位置的固定促进了量词和名词联系紧密;量词和名词意义搭配稳固后,量词从计量功能发展出了与名词指称相关的类别、转指、无定等功能;语义功能的语法化,使“数+量+名”结构产生了变体“数+量”和“量+名”;在句法变体中,量词的语义进一步语法化,增减量词成员数目,各成员分别调整称量对象,量词系统内部通过平衡机制协调发展。

二 量词语义的语法化途径

(一) 系统成员增减

量词系统的语法化过程必然是在成员基本固定后发生,大规模地增减成员会使语法化难以进行。但基于前文所述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语法化动因,量词这一类别不可能完全封闭,必得随着时代变化而略有增减。要从历时角度确定量词的新生与消亡并不容易,主要受到考察语料的范围大小、口语性质、时间归属、用例的数目等影响。宋代可以确认的新生量词不多,诸如“出”、“款”、“脐”等^[10],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限制,很难说是宋代新生且已得到广泛运用的量词。

宋代新生的量词如“项”,本义是“头后”,由头颈之意发展到用于称量可以分开计数的事物。其量词用法在唐代语料中未见到,始见于南宋语料:

⑤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8]56}

⑥且如州郡倍契一项钱,此是何名色!^{[7]1085}

⑦先生曰:“如何又生出这一项情节!”^{[7]983}

⑧三说九卦,是圣人因上面说忧患,故发明此一项道理,不必深泥。^{[7]1953}

而在《朱子语类》中,同样用于称量“道理”的量词还有“个”、“件”:

⑨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7]2919}

⑩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7]2892}

可见“项”用于计量个体事物的性质已很明确。“项”在宋代作为量词的用例较多,称量对象多样,还有指量、转指等功能,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且语法化程度较高的新生量词。

宋代消亡的量词如“挺”,本义是“拔”。出于挺拔、直立之义,“挺”可以称量许多条状物或长形物,也写为“挺”、“铤”。这个量词从南北朝到唐代都用得很广泛:

⑪玉封千挺藕,霜闭一筒柑。^{[11]陆龟蒙《京口与友生话别》,7210}

⑫向者入门来,案后惟见一挺墨。^{[11]梁宝《与赵神德互嘲》,9908}

但宋代难觅其踪,用例极少,称量对象也少,个别作品保留了以“挺”量“墨”:

⑬一铤墨。^{[12]《续传灯录》,51卷,584上}

⑭问佛法相当得两铤银。^{[12]《景德传灯录》,51卷,312上}

写为“铤”,可能是有意拟古,也可能是“铤”之书误。而在宋代口语中,原以“挺”称量的事物改与其他量词搭配,如“墨”多以“点”计量,“藕”用“枝”称量:

⑮一点水墨两处成龙。^{[12]《景德传灯录》,51卷,349上}

⑩枝枝红藕发心田。^{[12]《乐邦文集》,47卷230下}

检宋代语料,“挺”的谓词特征突出,与名词的语义匹配性差,因而逐渐退出了量词系统:

⑪挺身空中。^{[12]《传法正宗记》,51卷,726中}

⑫挺然骨目。^{[12]《圆悟佛果禅师语录》,47卷,808下}

量词“腰”的消亡,则是与名词的发展有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提到了量词“腰”的衰落:

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为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为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13]208}

检宋代口语语料,“腰”作量词仅有三例,且已不用于称量“带”,而用于称量裤子,如:

⑬与他一腰裩。^{[12]《虚堂和尚语录》,47卷,1025上}

⑭令侍者送袴一腰与之。^{[12]《虚堂和尚语录》,47卷1025下}

“裩”、“袴”均义同“裤”。“裤”,《说文》段注:“今之套裤,古之袴也;今之满裆裤,古之裩也。自其浑合近身言曰裤。”^{[14]358下}后世除了《金瓶梅词话》还保留“裩”作为构词语素,“袴”已不见于后代语料,自然,“腰”这个以部分代整体的量词也就随之消亡。

(二)称量对象泛化

从认知角度看,量词语义的语法化就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手段,利用旧途径表达新功能的过程,即用具体、已知的概念来理解、解释或描述抽象、陌生的概念。隐喻是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结构投射,其实质是基于不同概念之间的抽象的相似性,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15]。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由源元素向目标元素映射,其实质在于用常见事物明了、易感知的特征去指代事物整体或事物的其它特征或部分^{[16]7}。事实上,在量词语义的长期语法化过程中,早期形成名量关系多半是通过转喻途径,随后经过隐喻扩大称量范围。但到了后期,隐喻和转喻这两种途径往往交错而行,很难截然分开。从历时角度观察与量词搭配的名词,较容易看出语义演变的泛化途径的特征。

1. 同类直接泛化

量词与名词建立起语义联系后,扩大到同类事物,使量词称量对象直接泛化。比如“柄”作量词来源于其本义,《说文》段注:“柄之本义专谓斧柯。引申为凡柄之称。”^{[14]263下}南北朝时期,“柄”能称量的带柄之物只有“扇”,到宋代,“柄”所能称量的物类扩大到更多带柄之物,包括“帚”、“杓”、“刀”、“剑”等:

⑮义是一柄利刀,凡事到面前,便割成两片,所以精之。^{[7]1374}

⑯师颂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处别无调度。”^{[17]1175}

⑰我有一柄帚,扫尽雪山雪。^{[12]《法演禅师语录》,47卷,654下}

这一泛化过程中,最初是以部分称量整体的转喻,经重复使用固定下来后,以隐喻的方式扩大到相似的同类称量对象。

2. 异类放射泛化

量词最早与具体事物形成称量关系,固定下来后,通过隐喻将抽象事物具象化,形成新的称量关系,从而构成以量词为核心的放射状称量关系。比如“缕”的本义是“线”^{[14]《丝部》,656上},在南北朝时期常常用于称量“线”,这是基于名词本义而产生的转喻。宋代除了称量细微轻飘的实物,还可以称量情感。称量有形事物是基于“缕”的细长外形,在“线”的基础上转喻泛化而来:

⑱如何参得径山禅,今次答渠书。又复缕缕葛藤,不惜口业,痛与划除。^{[12]《大慧普觉禅师书》,47卷,922中}

⑲楼外垂杨千万缕。^{[18]朱淑真《蝶恋花·送春》,1406}

称量无形事物则是基于“缕”的轻飘细少质感而隐喻:

⑳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18]周邦彦《拜新月·高平秋思》,613}

㉑万缕千丝,何况新来病。^{[18]辛弃疾《蝶恋花·送祐之弟》,1879}

这样就以“缕”为核心,分别通过转喻和隐喻途径发展出实虚两类称量对象。从具体到抽象,这是量词语法化过程中常见的手段,文人作品中尤其突出。

3. 曲径层递泛化

量词的意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泛化,除了基于本义的,还有基于后起义的泛化,这就使得某些称量关系令人费解。比如“头”在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同“脑袋”义完全解体,通过转喻手段,可以称量兽类,也可称量人:

⑳ 有数头男,皆如奴仆。^{[19]虞翻《与弟书》,1421}

宋代“头”在此基础上泛化,多称量兽类,如“牛”、“驴”:

㉑ 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12]《虚堂和尚语录》,47卷,987上}

同时,宋代还有很多以“头”量“橘”的用例:

㉒ 何日五湖从范蠡,种鱼万尾橘千头。^{[6]《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1687}

㉓ 倦游欲去江,手种橘千头。^{[18]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1873}

“头”和“橘”形成称量关系是辗转用典所致。

㉔ 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20]46}

㉕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餽予。戏作赋曰:……命黄头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21]《洞庭春色赋·并引》,11}

“黄头”即“黄柑”,“千奴”也是“黄柑”。

这正好可以说明南北朝到宋代“头”的虚化过程:“头”称量“奴”、“木奴”,这是转喻,然后由“木奴”隐喻转而称量植物“橘”。但这种称量关系并不稳固,因为“木奴”是“奴”的下位词,它与“橘”之间的隐喻关系需要辗转用典形成,所以这种曲径层递的关系到了后代完全不用,即使是在宋代,也只出现在文人作品中,仅为文人曲高和寡的文字游戏。

与此相反,“头”在称量兽类的用法上通过隐喻产生“端头”义,用于指称个体,进一步隐喻,用于称量“人事”:

㉖ 若说是起头,又遗了尾头;说是尾头,又遗了起头;若说属中间,又遗了两头。^{[7]1500}

㉗ 惟做来做去,凑足成就一个物事贯通时,则千头万件,都只是这一个物事流出来。^{[7]868}

(三) 称量范围扩缩

从单个量词的语法化进程来看,称量范围并不都是由小到大的,称量对象的泛化并不能带来称量范围的绝对扩大化,这其中有两种发展类型值得引起注意。

1. 梭形发展

这是指量词的称量范围由小到大再变小。比如“尾”作量词,在唐代只称量鱼。到宋代,“尾”可以称量其他有尾之物,如“牛”、“羊”,通过转喻称量鱼形的无生命的物体,如“木鱼”,甚至因鱼而隐喻指称船:

㉘ 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鞞。^{[6]《书晁说之〈考牧图〉后》,1967}

㉙ 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6]苏轼《桀笋·并叙》,1756}

㉚ 江船百尾泊深湾,铁缆千环系长轴。^{[22]梅尧臣《阻风秦淮令狐度支寄酒》,3009}

到了现代汉语中,“尾”只适用于某一种特定对象。量词语义单一,而且比较具体,又只能称量鱼类了。

2. 蝶形发展

这是指量词的称量范围从大到小再到大。比如“段”作量词,意义来源于“分段”。南北朝时期,“段”称量的名词大致有物、文、事、时四类。唐代开始就未见量时一类,总体类别减少了。但到了宋代,量“物”的具体种类增加了,包括枪、鲸、绢、柴等:

㉛ 蚯蚓断为两段,两头俱动,未审佛性在阿那头?^{[17]209}

称量“事”和“文”这两个类别时,虚化程度高于前代,如在量“事”的意义上虚化,可称量心事以至情绪:

㉜ 凝眸处,从今更数,几段新愁。^{[18]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928}

㉝ 古人提唱一段因缘。^{[9]456}

在量“文”的意义上虚化:

⑫一段光明,未曾昏昧。^{[17]392}

⑬我与你说一段大义。^{[9]537}

三 量词语义语法化的内部协调机制

汉语量词系统的复杂性在于量词和名词不是一一对应的:静态孤立地看,既有一名多量,也有一量多名;动态系统地看,内部各成员之间有着自身的平衡协调机制。

(一)错综交替

大多数量词都可以称量不止一种事物,只要能在某个角度与事物构成隐喻或转喻,就可以进行称量。如“枝”称量的事物大体分两类:一类从“花”到一般条状物,这是基于局部替代整体,由转喻构成称量关系:

⑭师乃拈一枝柴吹两吹。^{[17]520}

另一类称量“灯”、“笔”等,这是基于外形上的相似,由隐喻构成称量关系:

⑮千枝先剪上元灯。^{[6]《春贴子词·夫人阁》四首之三,2484}

一个事物也可以由不止一个量词称量。如“屋”在宋代可以由不同的量词称量,即便是在同一语料中也有好几种称量法:

⑯内外屋宇数十余区。^{[12]《神僧传》,50卷,959上}

⑰虽食禄日久,家无余财,任金吾日,假官屋数间,以蔽风雨,亲族累重,糲食才给,人不堪其忧,光邨处之晏如也。^{[23]724}

⑱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7]102}

⑲如一个大屋,但见外面培墙周匝,里面间架却未见得,却又不肯做工夫。^{[7]717}

⑳程先生之说譬之一片大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厅堂房室,其实一也。^{[7]850}

㉑如一座大屋,只见厅堂大概,里面房室元不曾经历,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归于狂。^{[7]2354}

㉒古之士庙,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为室,其制甚狭。^{[7]2662}

只有在量词系统较为成熟时才有可能一名多量,使用不同的量词凸显出称量对象不同的特征,甚至语体色彩。如“船”在书面语体中多使用“艘”:

㉓遣天策府步骑将张少敌领兵五万,楼船百艘,次于岳阳,将进讨淮夷也。^{[23]724}

在口语色彩较浓的佛教语录中则多使用“只”:

㉔明早可为我寻一只小船子来。^{[17]1306}

(二)语义平衡

从名词和量词形成称量关系的最初语义联系来看,相同语义类别的量词和名词之间具备相同的称量理据^{[24]20},因而有相同的组合,如“点”和“滴”,“丝”和“缕”。但语言的经济性要求它们必须分化,各有侧重,从中可以看到量词系统的内部平衡机制。

南北朝时期,“片”由“薄而小”的意义出发,发展出了泛表“些少”的用法,如:

㉕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25]1000}

因为南北朝时期“点”还没能语法化到表示“些少”。到宋代,“点”可以表示虚化的些少的量了:

㉖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18]苏轼《水调歌头·快哉亭作》,279}

“片”即便称量同样的抽象事物,也不再是“些少”的用法:

㉗一片离愁醉眼中。^{[18]李之仪《采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346}

宋代“片”从称量类别和用例上看已相当稳固,在连缀成片的意义方面可以称量有形事物:

㉘程先生之说譬之一片大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厅堂房室,其实一也。^{[7]850}

也可称量抽象事物:

㉙你道一片事作么生。^{[9]589}

在平面片形的意义方面可以称量诸多实物:

㉚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6]《安平泉》,568}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片”还可以称量较厚的物体,如:

①弟子家中有一片石。^[12]《法演禅师语录》,47卷,661中

②中间有一片方砖。^[12]《法演禅师语录》,47卷,657下

而这些事物在宋代也用“块”称量,如:

④且道:“者一块石,在心内在心外?”^[12]《虚堂和尚语录》,47卷,1018中

⑤大官人见庄门闭着,不去敲那门,就地上捉一块砖儿,撒放屋上。^[26]《万秀娘仇报山亭儿》,465

可见,这一时期“片”和“块”还未完全分离,后来,“片”增加了“薄”的语义特征,才将这些事物完全交由“块”称量。

综上所述,和前代相比,宋代整个量词系统较为稳定,名量搭配关系也基本明确,但语义功能有限,还未能成为纯粹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显示出宋代量词尚处于语法化的中期阶段。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两个方面相互推动,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形成既交错又平衡的体系,这是贯穿整个量词语法化过程的规律。

注释:

①本文所述魏晋南北朝量词面貌均来源于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版);文中所述唐代量词面貌来源于王绍新《唐代诗文中名量词的运用》(《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赵中方《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4期),赵中方《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4期)。

参考文献:

- [1]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 [2]李讷,石毓智.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化的动因[J].语言研究,1998,(1).
- [3]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中国语文,2006,(5).
- [4]金福芬,陈国华.汉语量词的语法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S1).
- [5]郭锐,李知恩.从语义地图模型看量词功能的扩张[A].第二届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10.
- [6]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浩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颐藏主.古尊宿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0]赵中方.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1).
- [11]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2]大正新修大藏经[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1.
- [13]陆游.老学庵笔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5]Hopper, J. P & Traugott, C. E. *Grammaticalization* [M]. 2n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6]乔治·莱考夫.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17]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8]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9]严可均.全三国文[G]//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0]李冗.独异志[G]//丛书集成初编:283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2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23]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4]陈颖.苏轼作品量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
- [2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6]刘坚,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G].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责任编辑:唐 普]